

## “四化”阻碍共青团“三性”发挥的内在逻辑

■ 刘宏森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青年学报》,上海 200083)

**【摘要】**“四化”倾向严重阻碍了共青团“三性”的发挥,这与共青团面临的种种外部和内部制约性因素有关。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定位模糊引发价值异化、资源引导催生“唯上”惯习、急功近利助长短期行为、青年缺位导致监督缺失等。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工作理念取悦上级领导、机构设置忽视履行职能需求、工作方式注重“圈子”“号子”“面子”、运行机制缺乏双向良性互动等。“四化”使团组织必然“唯上”,“唯上”必然导致“封闭”,“封闭”必然导致“失群”,最终必然使共青团“失职”。“四化”是现实社会中种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全面深刻影响的产物,破除“四化”,增强“三性”,不仅是共青团的事情,党政工作体制的改革和机制的优化也必须配套,还有许多社会改革中的难题需要破解。

**【关键词】**“四化” 共青团 “三性” 群团改革

长期以来,共青团面临着“提高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扩大团的工作有效覆盖面”这“两大战略性课题”<sup>[1]</sup>。有人提出,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团组织和团工作中“行政化”“机关化”“贵族化”“娱乐化”“四化”现象对“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三性”的弱化和消解直接相关。因此,共青团要更好地履行使命,必须破“四化”、强“三性”<sup>[2]</sup>。很显然,把破“四化”和强“三性”并置,隐含着这样一种潜台词和逻辑预设:“四化”和“三性”之间具有内在的因果逻辑联系——“四化”是“因”,“三性”弱化导致“两大战略性课题”则是“果”。“四化”倾向严重阻碍了“三性”的发挥。当然,不仅是“四化”问题,共青团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会阻碍共青团“三性”的发挥。限于篇幅,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四化”何以严重阻碍了共青团“三性”的发挥和体现?如何认识和准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 一、对“四化”“三性”的基本理解

#### (一)“四化”的基本涵义

“化”的涵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事物发展当中呈现出的一种主要特征和特质;二是事物动态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的一种历史性惯习;三是指由这些主要特征、特质,以及历史性

收稿日期:2016-12-09

作者简介:刘宏森,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青年学报》主编,副教授,文艺学硕士,主要研究青少年问题、社会文化批评、思维科学、文艺美学。

惯习推断出的未来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简而言之,“化”就是一一直以来的做法、当下的主要特征和特质、未来的发展趋向。第一,“行政化”。行政手段在行政管理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共青团要组织和凝聚广大团员青年,离不开行政权力体系自上而下的运作。“行政化”是指主要依靠行政权力、行政命令等手段和途径,自上而下地组织和推进团工作,但却缺乏上下之间的互动。“行政化”的主要弊端在于行政体系内部的自我封闭,脱离了广大团员青年。第二,“机关化”。“机关”作为办事机构,发挥着一定的、不可替代的行政事务管理职能。“机关化”主要是指依靠纵向的行政权力体系,通过指示、报告、请示、会议等途径开展团工作。“机关化”使机关工作人员远离鲜活的现实世界和广大的基层群众,形成对资源的垄断专享。第三,“贵族化”。“贵族化”是“行政化”“机关化”的逻辑延伸。机关在自上而下纵向运行的同时,也会横向整合一些行政系统之外的资源,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这些资源网络在一定意义上对相关工作的推进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却难免走向相对封闭,衍生出自成系统的权力分配体系、资源配置体系、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处在这种体系中的组织自身难免会演变为“精英”俱乐部,把基层社会成员排斥在外。近年来一些团组织也有变成“精英”俱乐部之嫌,这是人们诟病共青团“贵族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娱乐化”。“娱乐化”主要是指一些团组织热衷于组织团员青年简单地开展一些唱唱跳跳、玩玩乐乐的活动,甚至把这些当成共青团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些活动往往特别注重包装、场面、声势和宣传效果。因此,“娱乐化”既指一些团组织活动内容的特征,也指其组织开展活动过程中体现出的某种价值追求。

## (二)“三性”的基本涵义

“三性”是共青团组织应该具有的基本特质。第一,政治性。共青团的政治性表现为“跟着走”,即有效组织、凝聚、引领亿万青年跟中国共产党走,为中国共产党夯实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共青团的政治性并非体现在抽象的理论和口号中,而是表现为凝聚、带领亿万青年跟党走的具体生动的社会实践。它是团组织和团工作的灵魂,是由团的历史、地位和功能所决定的。离开了这一点,共青团就缺乏立身之本。第二,先进性。共青团的先进性表现为“领着走”,即引领亿万青年按照党的期望和要求健康成长。先进性是由团的职责和使命、团员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这一特点所决定的。从根本上讲,团的先进性源于广大团员和亿万青年中蕴藏着的优秀的思想、理念、行为和成果。同时,先进性是一种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迁而变动不居的特质。因此,唯有善于提炼、吸收与整合广大团员和青年中源源不断产生的优秀思想、理念、行为及其成果,共青团才能永葆先进性。第三,群众性。共青团的群众性表现为“一起走”,即组织、引领亿万青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听党话、跟党走。唯有如此,共青团才能真正体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群众性的内涵十分丰富:(1)共青团善于从青年中汲取优秀思想、理念、行为和成果的营养;(2)共青团的干部能够坚持群众路线,从青年中来到青年中去,善于反映和代表青年群众的呼声与诉求,实实在在地为青年群众服务;(3)共青团的干部在广大青年群众中具有较高的威信和影响力,能够有效地引导、带领青年群众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为群团组织,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构成了共青团的基本特质,三者之间有着严谨密切的逻辑关系:群众性是共青团存在的基本前提与基础,是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目标;政治性和先进性是共青团的本质属性,为群众性注入质的规定性,构成了共青团与一般群团组织的本质区别。政治性和先进性不是标签和口号,它赋予了群众性以灵魂。

## 二、“四化”阻碍“三性”的外在因素

现实生活中,团组织和团工作内置于党政工作格局之中,既必须自觉接受党政的政治领导

和工作指导,又必须努力覆盖和影响广大青年。于是,共青团在党政和青年社会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在与党政和青年乃至全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来自组织之外种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尤其是社会价值观)因素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些外在因素必然会从组织定位、价值取向、工作理念、工作方式等多方面协力对共青团的特征和特质进行着深刻的形塑。因此,要搞清楚“四化”何以严重阻碍了共青团“三性”发挥这个问题,必须拓宽视野,具体分析对共青团和团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种种外在因素。

#### (一)定位模糊引发价值异化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对共青团的基本界定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sup>[3]</sup>事实上,团章在开篇就极其明确地指出了“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共青团组织的基本内涵(本质属性),对共青团的组织定位作了非常明确的界定。然而,现实生活中,共青团的组织定位却往往处于模糊状态。这与多方面的因素有关。(1)与人们对这一概念的选择性关注有关。从逻辑角度看,“群众组织”是属,“先进青年”“学校”“助手和后备军”等则是一些种差(修饰和限制)。毫无疑问,相对于“群众组织”这一抽象概念来说,“学校”“助手和后备军”等词汇更加形象生动,更容易被人关注。然而,定义的逻辑规则之一是:定义项中不可使用含混的概念,不应该包含隐喻。“学校”“助手”和“后备军”,这些词其实就是隐喻,其各自的内涵和外延事实上比较模糊。共青团作为“学校”的特质何在?什么是“助手”?助什么?怎么助?什么是“后备军”?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并不明确。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具体、清晰、明确,是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对于共青团来说,这也是其准确把握自身定位,并根据自身定位开展工作的前提。然而,更加关注“助手”和“后备军”,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群众组织”,难免会造成对共青团本质特性界定的模糊。这又势必会造成共青团自我定位的模糊、实际工作中的莫衷一是。同时,也使一些团干部处于社会角色“不确定”的状态。(2)选择性关注与社会现实有关。现实生活中,由于团干部年纪普遍较轻、(改革开放以来)学历越来越高,他们很多事实上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后备干部的重要培养、选拔对象。这就使人们形成了对共青团及团的干部一种笼统含糊而又似乎“约定俗成”的解读:“助手和后备军”就是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后备干部。事实恰恰如此,建国以来,党政把一部分行政职能和权力转交给共青团,并对从团中央到基层团委的各级团组织,在行政级别、资金预算、人员编制、职级设定、基础设施等方面,都有相应的安排和配置标准。团干部的工作调动,也是按照相应行政级别的领导干部对待。于是,一方面是对定位的模糊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将团干部视为预备官员,甚至已经具有官员身份和级别的事实,这两者的并存,使共青团常被解读为党政干部的摇篮,升官晋级、仕途发展的“快车道”和“仕途助推器”;团干部则常被解读为是后备干部、官员预备队的代名词。这就使“助手”和“后备军”成为共青团组织尤其是团干部最受关注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而由“助手”和“后备军”快速进入党政官员行列,便成为许多团干部最为重要的价值追求。毫无疑问,这样一种价值追求,必然助长一些年轻团干部对权力的向往和追逐,也从根本上助长了共青团“四化”现象的形成。

#### (二)资源导引催生“唯上”惯习

资源是任何一个个体和组织生存与发展、任何一项工作和事业推进与提升的前提和基础。凡是有助于人类个体和组织生存与发展、工作和事业推进与提升的各种主客观条件,都可以被视为资源。资源的种类多种多样,不仅包括物质条件、资金等,还包括人力资源、精神追求等。在现实生活中,谁掌控了资源,便意味着谁在人类群体中拥有了某种主动、优势的地位。毋庸置疑,人们倾向于向资源丰富之处汇聚,倾向于服从资源掌控者的意愿和安排。质言之,资源对于

人类的行为具有根本性的导向作用<sup>[4]</sup>。

团组织自身的生存、团工作的运行、团职能的履行,同样离不开资源。共青团要吸引和凝聚青年,就离不开资源的供给和吸引<sup>[5]</sup>。需要指出的是,不仅财政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等共青团的主要资源来自于上级党政领导部门的分配和调配,团干部自身发展的资源也主要掌握在上级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手中。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共青团对党政领导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在现行体制下,领导的肯定往往会给团组织带来更多物质、非物质的支持,能使一些团干部赢得更多的关注,迅速进入组织部门的视野,甚至可能得到意外的提拔,他们的仕途由此得以加速。这样的加速显然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抵得上团干部自身很多年的努力与付出。如何让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满意,便成为一些团干部特别关注甚至最为重视的一件事。李源潮指出:现在有一些团干部,人在青年工作岗位上,但对青年的成长、对青年的成功关心和用心得不够,他们的心思更多用在自己的成长和成功上。这种青年官僚主义作风应该改一改<sup>[6]</sup>。由此,一些团干部在价值理念、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工作机构、路径选择、运行过程等多个方面,都难免会养成“唯上”的惯习。

### (三)急功近利助长短期行为

胡锦涛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些党政部门恰恰缺乏这种远见,而陷于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和官场价值之中。急功近利社会心态的核心是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其基本模式是人们以资源和工具的尺度来衡量、把握、对待一切人和事;其实质是紧盯物化的利益,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甚至漠视人的生命的价值;其行为习惯是抄近路、走捷径<sup>[7]</sup>。毫无疑问,急功近利社会心态是导致当今社会多种乱象的主要根源之一。把共青团视为“学校”“助手”和“后备军”,常常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上级领导部门对共青团的态度处于一种模糊、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党政领导自然知道必须重视团工作,但他们要讲政绩、讲GDP。而“学校”既需要花大钱,又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益,“助手”和“后备军”还都算不上主力军,都是解不了近渴的远水。对团员青年、对团工作和青年工作,一些党政部门常常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有利的制度化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此,团工作难免处于理论上重要、实际中常常被忽视的境地。毋庸讳言,一些团干部年纪轻轻就成为党政干部序列中的一员,这使得他们比普通青年更熟悉和了解行政事务、行政规矩。他们中的一些人未能免俗地内化了出名要趁早、跟人要跟对、晋升要踏准步子等急功近利的心态、价值和行为准则,更关注和热衷于仕途发展。一些团组织和团干部把争取上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置于首位,而不是把青年的需求和愿望视为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在一些团组织和团工作中时有发生。

### (四)青年缺位导致监督缺失

青年是团工作的对象和主要依靠的力量,也是团工作的根本载体。然而,现实生活中,青年群众往往更多只是作为群众演员、劳力、观众和鼓掌者,“被”参与到团工作和青年工作中,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团工作和青年工作主体的地位。对团工作和青年工作而言,他们既不能建言献策,也难以监督和批评,缺少话语权。同时,由于共青团直接掌握的资源有限,青年群众难以从团组织得到更多支持,以破解自身人生发展中的种种难题。由此,青年群众越来越缺乏参与、监督、促进团工作的机会、热情和积极性。造成了有团干部的地方看不到青年、青年成堆的地方却看不到团组织和团干部的吊诡现象。主体缺位的团工作和青年工作场域,只能更多地成为一些团干部任性的空间和自娱自乐、自我表现的舞台。总之,在现行体制下,共青团定位的模糊和仕途发展“快车道”的现实,使一些团干部形成了一种核心价值追求:通过团工作这块跳板,快速

由“助手”和“后备军”进入党政官员行列；资源的导引作用，使一些团干部逐渐养成了“唯上”的思维与行为习惯；青年的缺位，使团工作和团干部缺乏必要的监督与批评；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使一些团干部目迷五色，忽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所有这些，都使得共青团的工作越来越局限于团组织机关内部和“精英”小圈子之中，越来越脱离亿万青年群众，由此助长了“四化”现象的形成和肆虐，共青团的高位截瘫也就在所难免。

当然，定位模糊、资源导引、社会心态和青年缺位等，这些主要还是一些阻碍共青团“三性”发挥的外部因素。除此之外，一些内部因素同样值得高度关注。

### 三、“四化”阻碍“三性”的内在因素

任何组织及工作的运行、职能的发挥都涉及价值理念、工作机构、工作方式、运行机制等多个方面。共青团也不例外。因此，考察共青团“四化”阻碍“三性”的内在因素，主要可以从工作理念、工作机构、工作方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入手。

#### （一）工作理念取悦上级领导

现实生活中，党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党组织尤其是其主要领导为具体代表的。主要领导个体的意志往往成为行政行为重要的推动力。让党满意，在现实的文化氛围、工作语境和官场惯习中，一定意义上就被理解为使主要领导满意。唯上，让上级领导满意，也为自己争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已成为不少团干部的基本工作理念。（1）片面强调围绕“党政中心工作”。一些团干部特别注重在第一时间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并大张旗鼓地加以落实，此本无错。但是，如何在围绕党政中心工作的同时，独立开展适应团员青年特点和需求的工作，是共青团必须更加关注的。冯文彬早在1940年就要求青年工作既不脱离政治任务 and 目的，又能以青年乐意的方式和方法去团结广大青年。然而，在这方面，共青团始终未能交出令党和青年群众满意的答卷。之所以如此，与一些团干部片面强调围绕“党政中心工作”，甚至一味唯上的做法直接相关。（2）忽视青年实际和需求。冯文彬指出，必须以青年乐意的方式和方法去团结广大青年，使他们感觉参加青年团体不是痛苦，而是有利、有味、有兴趣，才能逐渐提高他们的文化、政治水准与参加政治活动的积极性<sup>[8]</sup>。但多年来，共青团常常忙于机关内的文山会海，只盯着上级领导的要求，通过组织体系硬性部署工作，而严重缺乏对基层青年实际状况的深入研究，不能根据青年的特点和需求因地制宜地开展团工作和青年工作。这必然使团工作和青年工作严重脱离青年实际，无法融入青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之中，必然使团工作和青年工作远离青年，甚至受到青年的排斥。

#### （二）机构设置忽视履行职能的需求

近年来共青团的运行始终存在一些问题：（1）机构设置对应上级。共青团的机构更多的是对应于上级机构，而并非主要按照青年实际、青年工作职能发挥的实际需求进行设置。由此形成了从各级团组织到团员青年这样一条纵向的行政指令性、供给主导性体系。其实质是一种科层制官僚体系。在此体系中，“官大一级压死人”之类的现象在所难免。（2）难以实现全面覆盖。由于越来越多的青年学习、工作、生活在体制之外，在青年需求日趋多元化、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形势下，这种科层制机构难以顾及体制外广大基层青年群众的需求，共青团所能覆盖的青年日益减少。虽然近年来共青团进行了不少改革，努力扩大团组织和团工作的覆盖面、对青年进行分类指导等，但这些改革往往只是局部性的。“唯上”理念不改变，共青团的机构设置就必然难以适应青年群体日益分化、青年需求日益多元化的现实，也必然难以实现对青年的全面覆盖。

### (三)工作方式注重“圈子”“号子”“面子”

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文山会海。多年来,共青团主要经由纵向的行政系统,通过会议和文件对各级基层组织进行自上而下的指挥,而直接联系青年尤其是深入基层联系基层青年则难以做到。事实上,会议和文件精神常常不能真正进入基层青年的视野和生活之中。(2)圈子人脉。在青年越来越多元化和原子化的当今社会中,共青团整合的多方面横向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对团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一些团干部往往“重精英、轻草根”,比较注重对其自身日后发展所需的人脉等资源的整合与积累。相关行业中的头面人物往往会被团组织 and 团干部们积极纳入“彀中”,形成各种“圈子”。很多工作的运行,多是都通过这些“圈子”酝酿、决策和实施的。而那些默默无闻的基层草根、外来务工青年则难以进入他们的视野,往往会被排斥在团工作和青年工作之外。(3)表征化作为。一些团干部往往在团活动的口号(号子)上下功夫,不惜工本制作KT背景板、广告衫、影视作品等,搞一些花花绿绿的仪式性活动。毋庸讳言,这其中有不少属于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比如,十年前,团中央大张旗鼓地评选出全国团校首届精品课程。但首届之后,至今也未举办第二届。第一也就意味着最后,“诞生之日常常就是死亡之时”一类的现象在团工作中并不少见。(4)娱乐化作为。一些团组织常常忽视青年生存和发展中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尤其是回避青年中的各种思想问题,而往往以“贴近青年”的名义,搞一些唱唱跳跳的活动。事实证明,这样的活动并不能吸引广大基层青年的积极参与:一方面,相对于社会文化机构和企业举办的活动来说,共青团举办的活动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未必具有多大优势;另一方面,近年来,青年中思潮迭起,众声喧哗,共青团整体上却常常处于失语状态,不能帮助青年释疑解惑。话语缺位自然难以吸引青年,更难以承担引领和统一青年思想的职能。

### (四)运行机制缺乏双向良性互动

现行的共青团工作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上传下达、条块相辅两个方面。(1)上传下达。共青团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常常缺乏对广大团员、基层青年实际情况的准确了解和把握,难以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良性互动。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青年是在体制之外生存和发展,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运行空间日益萎缩。这就使得团工作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广大团员青年的现实诉求,更难以及时吸收团员青年中蕴藏的各种优秀思想、理念和成果。因此,共青团的工作必然会被广大团员青年视为与己无关。(2)双重领导。团组织历来接受团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这就必然使一些地方、企业单位的团组织面临“条块”如何更好协调的问题。不少地方团组织往往由于经费少保障、人手被抽调,使工作难以开展。一些地方党组织对团工作重视不够、支持不力,使得地方团干部往往会付出更多精力应付地方党组织布置的其他工作,特别是一些临时性、突击性的任务,以争取党政更多的资源支持。因此,共青团常常在上级党政的各种工作任务下疲于应付,难以针对青年特点开展工作,致使有些地方的团组织实际处于瘫痪状态。

## 四、“四化”阻碍“三性”的必然性

现实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社会价值)等多种外在因素深刻影响、形塑着组织和个人的思想、价值取向等内在因素。同时,种种内在因素也通过人们的言行外化为(并强化着)外在因素。在共青团种种外在、内在因素互为基础、相互催化的复合作用下,团工作中必然会出现“四化”倾向。“四化”倾向必然导致团组织“唯上”,“唯上”必然导致“封闭”和“失群”,最终使团组织“失职”,共青团“三性”的发挥更是无从谈起。其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

首先,“唯上”必然导致“封闭”。因为“四化”,一些团干部必然“唯上”。他们更注重揣摩上级领导的心思,更注重通过种种行政权力的运作开展工作,更注重赢得上级领导的关注,更注重积累个人发展资源。因此,他们自然难以眼睛向下,既不能满腔热情地走近团员青年,准确把握其需求和困难,也不会付出更多精力帮助团员青年破解难题、回应其思想困惑。一些团干部忙于“办公室里列提纲,关起门来写文章,空洞无物几条杠,群众面前打官腔”。正因如此,他们既不能把党与团的声音和意志及时准确地传递到团员青年中,也难以集中和提炼团员青年中蕴藏着的优秀思想成果。“封闭”就会在团组织和团干部与广大团员青年之间形成严重的隔膜,极大地阻碍着团组织和团干部与广大团员青年之间的心气相通。

其次,“封闭”必然导致“失群”。一些团组织和团干部自我封闭于机关和行政权力体系之中,满足于通过行政权力开展工作。虽然他们整天忙碌,但团员青年却未必领情。他们闭门拍脑袋推出的种种工程、举措,由于不能满足团员青年的内在需求,不能解答团员青年内心的疑惑,常常受到团员青年的冷落,乃至暗中排斥和抵制。久而久之,对共青团举办的活动,不少团员青年失去参与的欲望和热情;对团干部,不少团员青年不仅缺乏亲切感,有时甚至把他们视为眼睛向上、心气难通的“熟悉的陌生人”。如此,共青团必然失去在团员青年群体中“一呼百应”的号召力,甚至失去团员青年的拥护、支持。

最后,“失群”必然导致“失职”。青年是社会中最为重要和宝贵的人力资源之一。为党和政府整合青年这种最为重要和宝贵的人力资源,引领亿万青年跟中国共产党走,为中国共产党夯实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这是共青团的使命和职责,也是其“政治性”“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唯上”“封闭”必然导致“失群”,必然使团组织事实上“失职”,无法履行其使命和职责。

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共青团积极推进组织体制和工作模式改革,努力消除“四化”倾向。作为试点单位,上海和重庆的团组织推出了不少改革举措。比如,探索团干部遴选新机制;团机关精简编制,强化基层力量;打造“网上团组织”;发挥青少年事务社工在基层团工作中的作用等<sup>[9]</sup>。这些举措直指“四化”导致的种种弊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然而,改革刚刚启动,其实效如何,还有待于实践检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行共青团体制是沿袭现行党政工作体制形成的,因此,破除“四化”,增强“三性”,不仅是共青团的事情,党政工作体制的改革和机制的优化也必须配套,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特别是整个社会改革中的许多难题需要破解。

## [ 参 考 文 献 ]

- [1] 张炎良:《共青团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http://china.jyb.cn/gnxw/201511/t20151123\\_644093.html](http://china.jyb.cn/gnxw/201511/t20151123_644093.html)
- [2] 《增强“三性” 破解“四化”推动深刻革新》, [http://www.jfdaily.com/pl/bw/201511/t20151121\\_1956805.html](http://www.jfdaily.com/pl/bw/201511/t20151121_1956805.html)
- [3]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 <http://www.cnfla.com/zhangcheng/34949.html>
- [4] 刘宏森:《“共青团资源论”论纲》,载《青年学报》,2014年第3期。
- [5] 胡献忠:《社会变革中的共青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
- [6] 李源潮:《肩负起带领全团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重任》,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624/c363174-21949406.html>
- [7] 刘宏森:《留守之殇:功利祭台上的牺牲》,载《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15年第4期。
- [8]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38-1940.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815-816页。
- [9] 王烨捷 周 凯:《上海:越来越多的青年将与共青团组织“约会”》, [http://china.jyb.cn/gnxw/201511/t20151123\\_644093.html](http://china.jyb.cn/gnxw/201511/t20151123_644093.html)

(责任编辑:邢 哲)